

# Column

■思想

## 天人合一 万物平等

——小议循环经济的伦理观



◎高辉清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发展战略处处长

许多人在走入成人阶段的瞬间都会因同一问题而困惑,即我为什么而活着?自古至今,这是人生一个根本性问题,而与人的生存状态无关。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人历经磨难而依然信心满满,意气风发。同样,也看到许多人功成名就,却内心空虚,精神迷茫。

事实上,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活着找到理由。宗教从原始社会就开始形成,至今生生不息,根枝繁茂。因为它有一个最主要的功能:能够帮人解决有关前世、今世与来世的困惑,从而也就让人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更有意义。

经济也一样,它同样需要解决为什么而发展的问题。换一个角度说,就是经济发展需要遵循什么样的道德伦理。韦伯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正是新教徒的道德伦理才催生了资本主义。新教徒们出于荣耀上帝的目的,一方面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讲究信用,克制私欲。由此才产生并发展起了以股份公司为基础的大工业。从此以后,社会财富犹如泉水一样不断地涌现。

也许正应了中国的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种线性增长模式。在公元元至公元1000年,世界GDP没有任何增长,而且还略有下降。而在1500年至1820年间,世界GDP年均增长幅度为0.3%。在这样一种增长情况下,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完全处于自然和环境本身修复的范围之内,人与自然的矛盾并没有显现。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来临,经济开始出现加速度增长,1820年至1950年,增长幅度升为1.3%,1950年之后则达到了4%左右。经济的指数型增长使得自然资源供应与匹配规模之间增长模式渐渐开始不匹配了。这种增长模式的不匹配在初期并

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匹配造成的负面影响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粮食短缺、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现象日益恶化,终于使得人们意识到了经济的发展能力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限度。所以,工业化引发了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它同时也可能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的风险。照目前这种趋势,地球46亿年来形成的无数不可再生资源,可能在不到400年内全部消耗殆尽。

溯本追源,有专家研判说:西方主流宗教的伦理观可能出了问题。他们的证据在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24节。上帝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样子造人吧!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一切牲畜、野兽及爬虫。”这是一种独特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由于人类被赋予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权,人们无法平等地善待大自然,并导致了人与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很显然,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来自西方国家,因而都受到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支配,如果不通过一些方式对这种经济模式带来的影响做出适当调整,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似乎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伤害。

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们选择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清洁生产、绿色消费、绿色GDP等发展战略相继被提了出来。但是,从以往的发展历程看,任何经济模式的成功都需要建立在相应的经济伦理基础上,否则都将难以持久。于是,循环经济伦理学又成了显学。

近两年来,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在我国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循环经济伦理学基础方面的研究已经跑到了世界的前列。中华文明强调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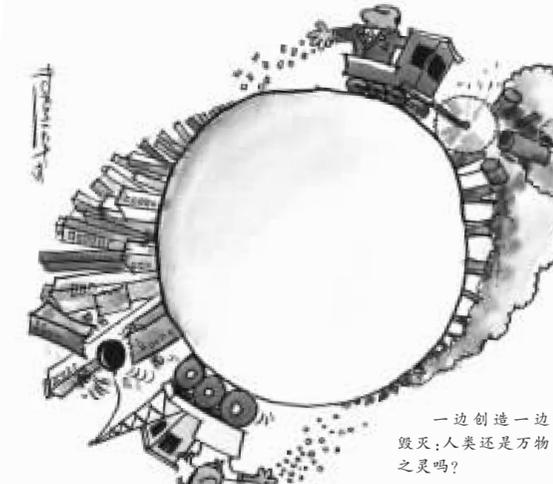
人合一,我们祖先的智慧中有不少道德伦理可资借鉴。比如,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认为在真谛意义上的一切现象均平等,无贵贱高低之分。作为佛教大力弘扬和提倡的一个重要理念,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强调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的平等,同时强调人与佛的平等,认为众生皆有佛性,都可成佛。以至于宋代僧人清远说:“若论平等,无过佛法。唯佛法最平等。”

显然,与仅仅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相比,佛教“众生平等”的范畴要宽得多。但是,若用“最平等”来概括,则还是有些名不符实。既然是“众生平等”,则非生物必然不在平等之列。事实上,即使动物和植物同为“众生”,其待遇依然不同。中国佛教徒“扫地怕伤蝼蚁命”,提出戒酒肉、不杀生,但并不忌讳砍树木、吃素食。

与之相比,道家的哲学伦理反而要更进一步。老子《道德经》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而庄子《齐物论》亦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思想,相对佛教的平等而言又是一种拓展。

从表面看,道家的“平等”拓展到了“万物”,已经到了极至。但是,它依然不能够完全满足循环经济在伦理基础上的需求,因为道家的“万物”是指现实存在之“物”。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强调的是“国际公平”和“代际公平”。其中,“代际公平”指的是,当代人不能够侵害后代人的利益——哪怕是在一万年以后才会出生的那一代人。

如此看来,建立循环经济的伦理观恐怕难以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只需简单地“复古”一下就可以了。在一些地方,显然还需要我们从“心”开始。



一边创造一边毁灭,人类还是万物之灵吗?

■彼岸

## 重返白宫? 戈尔一盘妙局两步臭棋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  
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输掉了2000年的大选后,回归普通公民的生活。由于选票的接近以及美国最高法院的介入,戈尔及其支持者一直认为布什“偷走了”大选,戈尔本人因此非常郁闷。卸任不久,戈尔的体重急剧上升,并留起了大胡子,一副落魄的样子,一次还因超速驾驶被警察开了罚单。当时戈尔一人在州际高速公路上狂奔,当班的警察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来。当然,美国警察不会因为戈尔曾经是副总统而饶了他。

也许是自感在政治上无东山再起的机会,戈尔便开拓了其他的领域,比如与人合资办了个有线电视频道,可这些创业都不成功。于是,20出头就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他还是重操旧业返回政坛。与别的民主党政客不一样,戈尔并没有选择反对伊拉克战争等作为自己的主题,却选择了“全球变暖”作为再入美国政坛的主题。戈尔近期在美国推出的有关“全球变暖”的大片《不方便的真理》(An Inconvenient

Truth),应该是戈尔为自己2008年的大选拉开的序幕。

为什么戈尔要选择“全球变暖”作为回归政坛、出击2008年大选的主题呢?这就是戈尔的高明之处。没有选择反对伊拉克战争,国家安全、发展经济的主题,是因为戈尔明白,虽然反对伊拉克战争能获得不少民意的支持,可在这几年里民主党反来反去,也拿不出与共和党不同的解决伊战问题的方案,在反恐和国家安全方面,大多数美国民众和共和党政策下的经济形势也速驶被警察开了罚单。因此,戈尔回避了这些主题。

要想当美国总统,必须要向美国的选民承诺并解决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戈尔便将“全球变暖”提到了比国家安全等还重要的程度,他在电影《不方便的真理》里说,“全球变暖”已经发展成全人类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将来会因为温度升高,冰雪融化而把全球淹没,毁灭世界和人类。由于共和党素来对环保不很友好,当然就需要环保政策更好的民主党来面对“全球变暖”的挑战。此外,美国的能源和汽车行业也与环保以及“全球变暖”有很大的关系,这样一个切入点,又涉及到美国另一个热点即能

源问题。

果然,最近《不方便的真理》电影在美国引起极大的反响,戈尔也成了媒体的焦点。但是,戈尔又在这一“全球变暖”的策略执行上至少犯了两个重大错误。

首先,为了强调“全球变暖”的确切性和严峻性,并非科学家的戈尔把属于科学范畴的话题讲过了头。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戈尔宣称,科学家们关于人类造成“全球变暖”的争论已经结束,这已经是一个不再需要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全球变暖”,人为的因素与自然变化的原因哪一个更大,都还是科学家们在争议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气候学家Lindzen博士7月2日在《华尔街时报》上撰文指出戈尔说法的错误,Lindzen博士还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全球变暖”更有可能是由于自然的变化所造成。

第二,在前不久携这部影片去参加国际电影节时,戈尔乘坐了私人包机。按戈尔那样的环保人士的倡导,为了防止进一步“全球变暖”,美国人不应该再开耗油量大的美国产SUV,而应该去买日本产的油电小汽车。可戈尔却忘了,私人飞机比SUV要耗更多的汽油,他的私人包机之行,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果戈尔在2008年真能获得民主党的提名,就算我同意“全球变暖”是人为造成,需要治理,也不会投票给他。因为他乘私人飞机,消耗了更多的汽油,说明他并不相信人为造成“全球变暖”。

■眼观四处

## 新加坡小国大金融凭什么

股指期货与资源抢占(一)



◎李国旺

银河基金管理公司  
市场总监

股指期货对投资者来说不仅是一种交易手段,也是一种风险管理和利润锁定的工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股指期货更是一种开发金融资源和金融定价权的战略资源。

一种交易手段必然吸引相应的投资者去交易以获取利益,由于路径依赖的关系,一种交易手段一旦为投资者所掌握,这种交易手段和交易平台也掌握了投资者的中国。中国的期货发展非常曲折,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放任到90年代末期的严格管理,期间出现了谈“货”色变的阶段,还曾经有过“你要害人,就动他做期货”一说。经过近6年的整顿,国内期货市场逐步走上了轨道,最近5年的期货市场大牛市没有出现过去、危急“事件”,说明管理规范化和监督管理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铜、铝、橡胶等期货交易基本上与国际接轨,中国上海价格已经是国际期货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商品期货市场为我国相关企业的风险分散和成本锁定作出了巨大贡献。期货也从过去的风险放大器成为现在风险分散的重要手段,从而为相关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型的金融平台。

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单有商品期货已经不能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金融价格风险管理的需求。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金融期货的交易量和价格发现能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商品期货的价格定价能力。比如,美元期货可以直接影响以美元计价的石油、铜、铝、黄金、大豆等商品期货价格趋势。仰仗着美元霸权而来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强大定价权,华盛顿只要紧紧掌握美元的价格趋势,就可以利用美元

■乱弹

## 夺回中国资产定价权



◎周洛华

国泰君安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并购部副总经理  
上海大学金融系副教授

长期以来,我国的各项资产的实际定价权都受外国资金的影响。石油、铜和铁矿石等战略资源的价格被海外大量的对冲基金推高到接近历史新高的位置,造成中航油和国储局在原油期货和铜期货上的重大亏损,我们只能一路调高国内汽油价格,最终接受了海外市场的定价。现在沪深股市的定价受香港股市的影响越来越大,只要中国石化H股开始下跌,A股市场就会连累不断地下调,海外对冲基金也聪明得很,每当我们国内股市跃跃欲试要上新高的时候,海外投资银行就会抛出一份看空中国石化H股的研究报告,一下子把目标价下调20%左右。没有办法,是我们自己把这些优质大型国有垄断企业送出去让人家定价的么!我们只能接受人家对我们资产挑三拣四的批评。甚至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也或多或少是由美国财政部决定的,我国长期实行人民币和美元保持稳定的政策,当美元由于美国财政连年巨额赤字而贬值时,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也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元下跌,致使我国大中城市房价暴涨,居民相对收入下降。

新任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是高盛的前总裁,提名不久他就抛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话:关键不是要让人民币升值,而是让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听起来他可能比前任会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有所放松,其实不然。让人民币升值无非是吆喝厨子要在某一个菜上多放盐,而开放金融市场则是要整个酒楼都按照他的菜谱和经营理念来运行。

为什么我们本土的金融期权不能应运而生,自主地决定中国资产的价值?为什么我们总是把海外市场的定价作为标杆,被动地接受?这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不能像中国足球那样窝囊,应该像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一样顽强。我们要夺回中国资产的定价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时机是成熟的。

过去,政府制定许多条例都是为了限制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海外市场兴风作浪,我们却是手无寸

期货为其国内政策服务;通过美元价格贬值抬高石油价格,如果不能利用单纯的美元期货实现这一企图,就运用“战争”这一现代美国式“投资银行”手段,在中东地区发动“石油战争”,迫使与美元抗衡但需大量消耗石油的欧洲和日本的货币贬值,从而利用美元作为超级调控工具,花全世界人民的钱而坐享铸币税。

在目前条件下人民币还不可能与美元面对面抗衡,但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宏观基金急切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客观形势,推出一系列指数期货,如股指期货、人民币远期利率期货,既可以满足国际资本特别是宏观基金的投资需求,还可以紧紧掌握这部分优质客户,为国内企业的改革提供外部的资源和力量。

为此,我们应当改变只有自己的资源才能使用的老观念,在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想方设法充分利用国际金融资源。新加坡是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国,但它却设计出一系列充分利用国际金融资源的制度和平台,无论是股票上市还是国际能源期货交易,它已经成为国际商品和金融价格定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新加坡又要利用中国经济发展和股市改革的成果推出中国50股票指数,直接在国际市场拦截优质客户为其服务。如果这部分欲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客户可以通过新加坡实现其利益,鉴于新加坡在金融市场和后期服务方面的优势,加上客户本身的路径依赖关系,我们将失去很重要的国际客户。而客户资源的损失直接关系到金融价格定价权的实现程度。因为金融价格是大量的交易才能逐步发现的,客户越多,交易量越大,其金融价格的形成才能越容易为国际市场承认,中国的金融产品价格才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价格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金融产品资源才会持续开发,反过来吸引更多的客户进入中国金融期货市场,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内商品期货管理水平已到了相当的高度,金融期货的推出不能再延迟了。如果进展缓慢,将直接反过来说影响我国的商品期货的深度发展。

铁,无以应对。现在大家终于相信了这样的事实:无所作为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标,我们必须积极应对。

新近颁布的融资融券条例和指引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融券,是很有价值的突破。中国本土的对冲基金就此找到了生存的土壤,获得了准生证。允许做空机制的存在不仅不会打压市场,反而还会让市场快速稳定下来。过去一谈到对冲基金,我们总是眉头紧锁,越是不了解越是害怕和抵制。其实,对冲是一种先进的投资理念,作为一种交易策略,对冲用好了可以稳定市场。与其让人挥舞着对冲的指挥棒来决定我们的命运,不如拿起对冲的武器和他们拼出一个平等的秩序来。

最新推出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有助于实现我们对本土资产主权定价的目标。举例来说,华能国际有A股和H股,过去,海外对冲基金很容易就决定了H股的价格,而A股则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高价,应该向H股靠拢。现在好了,我们可以通过同一市场不同标的物的对冲来决定华能国际应有的价格了。我们可以用跨市场双做多的对冲策略,同时做多华能A股和煤炭期货;只要我们看好华能的经营能力和煤电联动的长期策略,就可以自主地决定华能的价格。与此同时,另外一批人可能同时做空华能A股,做多长江电力A股,因为他们可以看好煤电联动而看空华能的经营能力。我们可以同时发明和运用多种极具创造力的对冲交易策略,这些策略的应用,能够使华能的A股股价成为一个合理的均衡价格。这些优势是H股不具备的,到时候,恐怕是H股的价格主动向A股股价看齐了。

金融期货的诞生也是配合融券业务而来,两者相互补充,有利于活跃市场,造就一个强大的中国金融市场。海外对冲的操作手段固然灵活多变,但是我们也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可以本着一个算法来放下“多头黄金,空头石油”的交易比例,我们也可以做法,只要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开放,完全可以把商品期货,货币远期和证券交易联系起来。

没有金融市场的各种创新手段,我们将永远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二流观众。融资融券和金融期货将允许我们合法地做空,并将由此培育中国本土的对冲基金。我们将首先确立A股的定价权威性,最终必将影响全球其他市场的定价。我们有信心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定价中去。

■识小录

## 同情的想象力



◎梁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研究生 专栏作者

转眼又是7月17日,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忌日。剑桥出版社今年重版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这已是跟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名著一样的经典了,每隔一两年就会根据最新校勘重印一遍,尽管大多数人只知道《国富论》,但学界却似乎更重视《道德情操论》。

也就在今年,国内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道德情操论》的专著——罗卫东博士的《情感秩序美德》正式出版。虽然过去市面上已经有好几种《道德情操论》的译本,但在翻译和认识上各有不少问题,很难帮助我们重塑斯密。国际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掀起一股“复兴斯密”的思潮,现在也该是我们中国人重新认识斯密的时候了。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奠定了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蕴涵了劳动分工和自由市场竞争的观念,这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自称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多半来自斯密和李嘉图。后来写出大书的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也都高度评价斯密。到了19世纪末,经济史家坎南一手策划了“斯密升级运动”,他编辑整理了斯密的遗稿,校注了《国富论》等书,斯密现代经济学创始人的地位由此确立。

在中国,严复翻译的《原富》(即《国富论》),是近代第一本中国人翻译的西方经济学名著。由于严复的译笔好,名气大,这本并不准确的《原富》对“五四”一代以及后来的学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第一个认识的大经济学家就是斯密,后来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斯密的真实形象。

可西方人也并不总是这样看待斯密的。虽然经济学者多年来只把他限定于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谱系上,芝加哥学派把他看成自由主义先驱而赞扬,欧陆学派从反面批评他的自由主义。但几十年前就有人注意到斯密被扭曲的形象了。哈佛大学的熊彼特在遗著《经济分析史》里就提出,斯密不应该算作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应该看作法国重农主义的余波。在斯密那里,经济学并没有清晰地从道德哲学里脱离出来。后人所讲的自由主义先驱,只是抓住斯密只言片语无限夸大的结果罢了。

应该说熊彼特的看法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直到最近这些年大家重新研究整理斯密时,才想起熊彼特几十年前的谈话。

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要比《国富论》早17年,而且一生修订多达6次,可见对其重视程度。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斯密其实是想写作“三部曲”的,全称应该叫做“想象的三部曲”。第一部是《道德情操论》,第二部是《国富论》,第三部也许应该叫做《法律与政府》,但斯密从来没有写完。或许已经写完,但他在去世之前当着朋友的面焚毁了手稿,故而我们现在无从猜测。

但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这三部曲是围绕想象力,围绕道德哲学而展开的。斯密在他一本极少被人提起的《天文学讲义》里就高度评价了牛顿的力学,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地组合起来,有条不紊地运行着。这不仅是天体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规律。

《道德情操论》的关键词只有一个“同情”,这是社会道德的基础,不是自私,不是恐惧,也不是爱,而是同情。其他这些情感都不能必然地包含同情,比如你可以爱一个人而并不同情。但如果缺乏同情,整个社会就缺乏交流的基础了。你不会爱上世界上绝大多数陌生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如何交流呢?

只有同情,而这种同情必须通过想象力来实现。你没有直接体会到陌生人的欢乐和痛苦,但你却可以通过想象力,通过自身的经验与对方的感受相通,从而达到交流。斯密特别引入了一种虚拟身份“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每个人可以想象通过这样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来观察别人,这个旁观者知道一切又毫无私心,不喜别人所喜,忧别人所忧。虽然它并不必然地引导我们帮助弱小、惩罚罪恶,但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别人和我们自身是一样的,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都是真正的兄弟姐妹。

如果说《国富论》处理的是我们内部问题的话,《道德情操论》处理的就是“我们与邻人”关系问题,那是更广泛、更本质的问题。前者的核心是“看不见的手”,后者的核心是“公正的旁观者”,都只是依靠我们想象力构建出来的概念。

我最后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它们的关系。我们喝一杯酒,自己收获了效用,别人收获了财富(比如酿酒师);我们给别人喝一杯酒,别人收获了效用,我们自己收获了同情。前者在《国富论》里讨论,后者在《道德情操论》里研究,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和谐。